

论《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和宗经的理论及内在关系

谢 勇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反映在《原道》至《辨骚》五篇中,《序志篇》称这些篇目为“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关系密切,阐述执正之理,核心是阐明圣人根据道和上天意志制作的经书是文章的典范和渊源。因此为文必须宗法经书,故《宗经》是三篇的结穴所在。在这三篇中,刘勰阐明了对文学的起源和作用、文学的艺术思想标准这些文学问题的根本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宗经;理论;内在关系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2-0075-05

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XIE Y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idea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s embodied in the first five chapters (*Yuandao*, *Zhengsheng*, *Zongjing*, *Zhengwei* and *Biansao*), which are referred to as the “hub” of the article by the last chapter *Xuzhi*.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three ones (*Yuandao*, *Zhengsheng*, *Zongjing*), for all of them elaborate the reason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and illustrate that Confucian class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ctrine and God’s will are the paradigm and source of all articles. Therefore writings are expected to derive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Zongjing* is the core center of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In these chapters *Liu Xie* clarifies his thoughts about literature such as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istic and thought standard in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Yuandao*; *Zhengsheng*; *Zongjing*; theory; internal relation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理论体系非常严密的文学理论著作,前五篇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刘勰在《序志篇》中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1]727} 其中《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阐述执正之理;《正

纬》、《辨骚》为一组,阐述驭奇之理,合起来构成了“执正驭奇”的基本观点^{[2]48}。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是一个层次,中心思想是阐明圣人根据道和上天意志制作的经书是文章的典范和渊源,因此为文需要学习儒家经典。

一、原 道

原道的道究竟指得是什么,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原道》中认为:“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此则道者,犹佛说之‘如’,其运无道不在,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孰非道之所寄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原道》中认为:“舍人论文,首重自然。二字含义,贵能剖析,与近人所谓‘自然主义’,未可混同。此所谓自然者,即道之异名。道无所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鱼草木,……”。杨明照在《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杨明照论文心雕龙》)中认为“刘安所原之道,是道家之‘道’;韩愈所原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刘勰所原之道,则为自然之‘道’。……什么是自然之道呢?刘勰在《原道》篇里把它概括为天文、地文、人文三个方面。”罗宗强在《读文心雕龙手记》(《释“文之为德也大矣”》)中认为“《原道篇》的道,是从老子、到《易》、到儒道融通的道。”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中认为:“以儒家思想为骨干”,这时他是倾向于道是儒家的道,后来他又在《文心雕龙讲疏》(《一九八八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更侧重于老子的自然之义”,这时他的观点有了变化,更加倾向于道家。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原道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荀子和《易传》的思想而来的”。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也不是道家的“无为”之道。”以上八种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倾向。黄侃和杨明照的观点相似,认为原道的道包括自然万物的道,社会生活的道;

刘永济、童庆炳和王元化的后期观点相似,认为原道的道是自然原始之道;罗宗强、张少康和王元化前期的观点一致,认为道是儒家之道。

刘勰提出“道”这一概念,这是要为后面说明“文”来服务的。文章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这一点在《原道》篇中有具体的阐述。《原道篇》开头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鍾,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

这里的文广泛地表现在自然界的各个方面。天上有日月的照耀,地面有山川的焕绮,“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原道》),形成了自然界各方面的形态或声音之美。这些“形文”、“声文”、“情文”诸现象,刘勰认为都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都是道的表现。这种理论说明刘勰认识到美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各个方面,人类写的文章的艺术美,则是较为突出地表现出美的一种事物。这段话里的“道”,很明显可以看出刘勰关于文章的发源“道”的理解受到了老庄的影响。《老子》说道是“万物之母”;“道法自然”。刘勰生活在南朝,其时社会动乱,政权更替时有发生,因此当时老庄思想和佛教成为人们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刘勰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

古代圣贤写文章来表现“道”,用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刘勰叙述文章的起源和古代圣人制作文章的历史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1]2}这里的“人文之元”,实际上是指文字和历史记载的起源。这段话与《易传·系辞下》有些相似,刘勰基本上同意《易经》的看法。刘勰对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加以总结,得出圣人根据道心、神理,制作文章,以立教化,三者的关系是:“道沿圣垂文,圣因文以明道。”

通过上面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刘勰《原道》里的“道”,前面指的是《老子》的道,偏向于老庄

思想,强调无为与顺其自然;后面说的道来源于《易传》,强调上天意志与圣人以神道设教。《原道》篇里的两种思想相结合,其实正是魏晋玄学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体现。但是从整部《文心雕龙》来看,刘勰显然更加重视的是儒家之道,他要以圣人之道来指导写作,要以反映圣人之道的经书来指导写作。只不过《原道篇》注意从本体论上论述“道”的本源,所以用了《老子》论道的观点。

二、征 圣

《征圣》的“征”有“征验”的意思,征于圣人,也就是把圣人的东西当做一种标准。圣人有两个标准,一是道德伦理方面,二是文章写作方面。刘勰主要说的是后一方面。《征圣》说到三个贵文:“政化贵文”、“事绩贵文”、“修身贵文”。这里的文既可以解释为具体的文章篇目,也可以解释为文章里面的一种修辞手法。

先看“政化贵文”,刘勰说:“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1]15}这里的“格言”指的是《论语》。《论语》是对话体,孔夫子讲教化,是通过格言的方式来表达的,即一种较短的话语。“唐世”指唐虞。“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是孔子对前代文化的一种赞叹。这些都表明孔子强调政治教化的作用,是以文为贵的。这是从政教领域谈文之可贵。“事绩贵文”是说历史的记载中也是注重“文”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郑国起兵攻打陈国,当时的盟主晋国质问郑国为何不事先报告。郑相子产回答说,陈国领了楚国来打郑国,填塞了井,砍伐树木,对郑国犯了罪,郑国向晋国报告了,但是晋国没有管这件事,所以要去讨伐。子产的话讲的理由充足,令晋国无言以对,孔子评论这段话:“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再看“修身贵文”就是说在修身养性、提高自己内在的时候,也要注重文采的作用。这种文采和情感的真正并不矛盾,即“情欲信,辞

欲巧”。我们知道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都是排斥语言的魅力,轻视文章的形式。认为词语用的越好越漂亮,说明你越不诚实越不实在。这是一种贵道轻文的思想。但是刘勰认为文章既要重视内心真情实感的作用,也要讲究一定的为文技巧,要讲究遣词造句的能力。刘勰在这里是一种中正平庸的思想,他认为“道”和“文”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其实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思想内容上有足够的深度,在语言文辞上也是赏心悦目的。以上说明圣人在谈政治教化、记录历史、品格修养时,都是很讲究文辞的。

《征圣》在讲到文辞在表情达意时有四种情况“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简言以达旨”就是用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出意思,也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之褒贬。刘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郑伯克段于鄢》的“克”字,“克”应该是用于敌对双方的。可是郑伯(郑庄公)和段(共叔段)是亲兄弟,这就表明作者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情是反对的。另一个是《礼记》“丧服举轻以包重”。《礼记》讲到丧服的时候说“缌不祭”,缌是用熟麻布制作的丧服,是一种很轻的丧服,穿这种丧服的人不能参加祭祀,那么穿重丧服的人就更不能参加祭祀了。“博文以该情”就是用很繁博的文采也能够确切的表达情感。刘勰在这里举了《诗经》和《礼记》里的例子。“《邶诗》联章以积句”讲的是《邶风》里面的《七月》,这首诗较长,是讲农业劳动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种句式在诗中反复出现。这种重章叠句、一唱三叹、反复吟咏的情况句式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反复的用一种句式不断的重复以达到“该情”。“明理以立体”就是明显直白的,刘勰在这里举了《周易》里面的两个卦象为例,一个是夬卦,一个是离卦。夬卦,他的下面是乾卦,上面是兑卦,也就是乾上兑下。我们知道,《周易》的卦象都有六根爻,夬卦有点特别,最上面的一根阴爻,下面五根全是阳爻,叫做“五阳决一阴”,阴爻表示一种阴柔,阳爻表示一种果断,五阳一阴,肯定是阳占上风,表现的是以刚克柔。八卦里面的离卦是中间

一根阴爻,上下两根阳爻,象征火,六十四卦里面的离卦就是两个离卦重叠起来。一个离卦就很明亮了,两个离卦更加明亮,所以意为“重明也”。这就是“明理以立体”的意思。“隐义以藏用”就是比较隐晦的,刘勰举了《周易》里面的“四象”和《春秋》里面的“五例”。《周易》里面的“四象”有很多种说法,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金、木、水、火四象。四象天生的,所以没有加上土。四象的精义是很曲折的、隐晦的。春秋五例讲的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几条是对立统一的,把这五例统一起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通过五经的举例,刘勰把简、繁、隐、显全部说到了,最后来一个总括:“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这就是说刘勰的《征圣》、《宗经》是把包括周、孔在内的儒家宗师们当作写文章的老师,把他们的作品当做文章的楷模。刘勰所看重的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东西,而是儒家写文章的方法。

三、宗 经

《宗经》全篇分三部分:一、概述诸经的基本情况及其教育作用;二、介绍“五经”写作的基本特点及其成就;三、说明必须宗经的原因。从经书和后代各种作品的关系看,刘勰认为各种文体都起源于经书;文章能够宗经,就会有六种好处,否则就会出现楚汉以后的文章创作过分追求形式的流弊,如汉赋和骈体文。

《宗经》和上一篇《征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圣人的思想观点是通过经典呈现出来的,所以要想学习圣人就必须学习经典,向圣人学习写作也必须通过经书。宗经意在论述为文之道需学习儒家经典,因为儒家经典,特别是作者论述的“五经”是后世文章的众类之源,且也为各文类树立了六种基本的写作原则。因此,“文能宗经”则“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聘无穷之路,饮不竭水源”,会从经典中汲取无穷的营养,指导写作,而后方能“励德树声”“不其懿欤”。

圣人的经书,即是后代各式文体文章的渊源,而且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树立了标准。刘勰认为《六经》文章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特色是“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就是内容深刻,而且形式完美。强调内容和形式二者都要注重,不可偏废。接着刘勰又提出作文如能学习《六经》,就能达到六个境界:“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1]23}六义之美是指:感情真挚而不浮夸,风貌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其中情深、事信、义直三者指思想内容,属于《征圣》所说的“正言”;风清指艺术风貌,体约、文丽指语言风格,属于《征圣》所说的“提要”。《宗经》的“六义”,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树立了六条标准,比《征圣》的“正言”、“提要”更加具体。

刘勰还认为经是后世各种文章体裁的渊源。如他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1]22-23}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五经》,包括了一部分释经的传,如《易传》、《礼记》、《春秋左传》等,这些著作大都产生于西汉以前。《宗经》例举论说辞序等二十种文体认为其体制源于《五经》,是有理由的。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写到:“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3]239}这是说先前的文章虽然不多,“数十篇耳”,但是体裁皆备。又说:“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格风度,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废也。”^{[3]250}就是说做文章,既要注重内容的充实,要言之有物,不做无病之呻吟。也要注重形式辞藻的华美,遣词造句的用心。这和刘勰的文学观相似。

四、《原道》、《征圣》、《宗经》的内在逻辑关系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的理论宗旨在于论述文章写作的根本原则。“《原道》篇通过对文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的论述,以“自然之道”为理论基础,提出“本乎道”以为文的思想。《征圣》篇通过“征圣”对《原道》篇的思想加以印证和阐发,从理论上具体提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和“衔华而佩实”的根本原则”^[4]。

首先,从“道”到“经”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桥梁作用的是“圣”,刘勰将其概括为“道沿圣以垂文”,道一圣一文,正是客体通过主体而反映在作品里的全过程。《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1]65-66}。这就说明圣在里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何晏在文帝时未授官职。到明帝时,因为他浮华,仅授冗官。所以说何晏那样浮夸浅薄的人不适合做圣人。

其次,“圣”是认识的主体,而“道”是认识的

客体。二者是通过“经”联系起来,刘勰称这是“圣因文以明道”。《神思篇》:“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悖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493}。这里说的是主体认识客体过程中,“文”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最后,《宗经》是《原道》和《征圣》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刘勰认为为文需要宗经,是因为经的写作原则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它“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是本乎“道”为文的模范样式,因而也是文章写作的模仿对象。为文宗经,就是要宗法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为文创作的规则。另一方面,儒家五经又是后世各种文章的本源。《宗经篇》:“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诗,则诗立其本;铭沫篇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参 考 文 献

- [1]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2]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8.
- [3]颜之推. 颜氏家训集解[M]. 王利器,集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9.
- [4]于维璋,祁海文.《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理论新探[J]. 文史哲,1995(3):85-89.